

●名著与经典解读

《史学要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建构史学理论的最初尝试

晋荣东

提 要：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从历史学的对象、目的、方法论以及价值诸方面对史学理论作了深入探讨，既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某些不足，又指出了相对主义史学观点的若干纰漏，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构史学理论的最初尝试。

关键词：李大钊 马克思主义 史学理论

在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的演进中，李大钊的《史学要论》（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今收入《李大钊文集》）一书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书从历史学的对象、目的、方法论以及价值诸方面对史学理论作了深入探讨，既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某些不足，又指出了相对主义史学观点的若干纰漏，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构史学理论的最初尝试。

一、对象：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

李大钊建构史学理论的尝试是以对历史学对象的讨论为起点的。与梁启超在“史界革命”口号下的主张颇为相近，李大钊认为：“历史学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变革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①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稍作分析。首先，这一看法明确预设了历史过程（history - as - process）和历史记录（history - as - record）的区分。人们通常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视作中国人的历史，但依李大钊之见，这种理解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前者仅仅是历史记录，而历史学的真正对象是“社会的变革”，或“不断变革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即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本身。

历史事实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内，往而不返，存而不在，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只能借助于各种记录来进行。鉴于史实的有限性、片面性，如果不注意区分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势必容易导向否认历史过程客观性的后果。在疑古派与信古派的论争中，柳诒徵等人采取“考信于六艺”的态度，不对史料作辨伪考订的工作，提出与文化演变的实际进程相左的三代至上文化史观，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无视上述区分使然。相比之下，李大钊区分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认

定前者构成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后者仅是历史研究的必要条件，无疑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捍卫了历史过程的客观性。

其次，对历史学对象作如上理解意味着某种历史总体性的观念。“历史既是整个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不容片段段的割裂。文化生活的各体态、各方面，都有相互结附的关系；不得一部分一部分的割裂着看，亦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为历史内容的全体。”^②从历史的总体性出发，李大钊进一步批评了那种把政治或国家的历史看成是历史的唯一内涵，并以政治为中心去考察社会变迁的观点。

据唯物史观，历史科学无非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③在历史学对象的理解上，“一方面把历史与社会打成一气，看作一个整个的；一方面把人类的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亦看作一个整个的；不容以一部分遗其全体或散其全体。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④历史观念的获得应归功于马克思，这说明李大钊对历史学对象的理解是以唯物史观为前提的，这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他史学理论的建构有着梁启超等人难以企及的理论起点。

二、目的：描写事实和确定法则的统一

辨析历史认识的目的是史学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只有从一门科学的目的出发并深入其方法的逻辑结构，才有可能对这门科学作深入而完整的理

解。在哲学史上,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致力于研究历史科学的逻辑和认识论。依李凯尔特之见,“规律”这个概念涵盖的仅仅是那些可以无数次重复出现的东西,由于历史事件所受因果制约的一次性和个别性,它不可能在普遍的因果规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历史”实质上是一个与“普遍规律”相对立的概念。换言之,“历史发展规律是 *contradictio in adjecto* (语词矛盾)。”^⑥以此为前提,“历史的科学目的,即对现实中的一次性的、个别的过程进行叙述”。^⑦

对历史事实的一次性、个别性,李大钊是有所见的,所谓“历史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就表明了这一点。^⑧不过在他看来,一般与个别、规律与事件总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在一次性的事件之间存在着稳固的、本质的联系即普遍规律。从阐明历史学的特性角度看,李凯尔特把历史学视作一种“事实学”(历史学的对象是个别化的历史事实)固然有其相当的理由,但由此并不能将马克思把历史学理解为一种“法则学”(历史学的目的之一在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理论完全推翻。^⑨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李大钊指出,正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使历史学具有了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因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⑩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李大钊提出了自己关于历史认识目的的看法:“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为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⑪从19世纪的“艺术与科学”之辩,到20世纪的“事实与解释”之争以至新近的“叙述的复兴”,历史认识的目的一直为历史哲学家争论不已。近代以来,以孔德、巴克尔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虽未能把握真正的社会历史规律,但他们不遗余力地论证着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并把历史学的科学性归结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史学则主张把历史学从“自然科学的暴政”下解放出来,认为“历史学只有一个责任,即叙述事实”。由于对个体事实的叙述和描写恰恰是艺术的天职,故历史学根本不是一门科学,它只是一门研究过去真正的艺术。^⑫较之孔德和克罗齐等人的看法,李大钊统一艺术与科学、事实学和法则学、描写事实与确定法则的尝试无疑更为科学和辩证,尽管这一尝试还有待更为充分的论证。

就现代中国史学思潮的演进而言,以傅斯年为代

表的史料学派极力主张史学的科学化,把生物学、地质学等经验科学视为历史学的样板,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对历史作宏观的理论考察来总结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⑬继梁启超之后,以何炳松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史学反对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去建设新史学,认为“世之习史者,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因果”,“其言似是,其理实非”^⑭。如果注意到在李大钊对历史认识目的给予科学回答之后,还有不少的人将历史事实的描写和历史规律的发现割裂开来,那么我们应该能对李大钊的贡献有一更为全面的评价。

三、经验与理论之辩及历史的客观性问题

史学理论是围绕“历史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展开的,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仅要正确理解历史学的对象和目的,还必须对其方法论给予科学说明。历史学的方法论是指体现于史学研究中的一般方法论原理,其基本内容就是经验与理论的关系。所谓经验,首先指向的是实证性的史料:“史学原以历史的事实即是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为研究的对象,故调查特殊的历史的事实而确定之,整理之,记述之,实为史学的重要职分。就历史的事实为科学的研究,诚不可不基于就特殊情形所为事实的观察和征验;故特殊史实的精查,乃为史学家的要务。”^⑮一次性的历史事实全赖史料得以保存,后者构成了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事实的前提,于是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辨伪考订便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史料构成历史认识的前提,但又必须防止从强调经验、注重实证走向对理论的否定。所谓对理论的否定,大致表现为彼此关联的两种倾向:其一是反对理论在史料整理、解释中的积极作用;其二则认为从史料中不可能抽绎出理论和规律。在现代中国,王国维崇尚“事证主义”,认为历史研究只能根据史料来考察事实,反对用后人的观点或理论来解释史料,“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⑯而傅斯年将史学限定于史料学,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反对在史学研究中进行理论的分析 and 阐释,认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我们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所以归纳是说不上来,因果是谈不定的”。^⑰

较之王国维、傅斯年等人,李大钊对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有着更为积极的评价。一方面,对历史事实的整理、说明和理解必须借助于理论才能实现,而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因素首推史学家的历史观:“历史观乃解析史实的公分母,其于认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连锁的关系,施行大量的综合,实为必要的主

观的要因。”^⑩另一方面，史学研究应该而且能够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理论性的结论：“史学家固不是仅以精查特殊事实而确定之，整理之，即为毕乃能事；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⑪要言之，历史研究是一个理论与经验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过程，历史理论和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循环”：历史理论的建立和论证有赖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的理解也必须借助于历史理论。

史学研究中的经验与理论之辩，内在地关联着历史的客观性问题（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objectivity）。分析地说，历史的客观性大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历史学对象的客观性，即历史学的对象是否是外在于研究者而独立存在的历史过程；其二是指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即历史认识能否为历史学家共同体所认可并成为相互之间的共识。

就前者说，通过区分历史过程和历史记录，并视前者为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捍卫了历史过程的客观性。从后者看，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仅仅是指记载历史事件，还指在史料基础上对历史事件的重建，即对史料的“解喻”（整理和理解）。那么历史认识或历史解喻的客观性又该如何理解呢？按李大钊之见，解喻必须以“活的历史”即历史过程为前提：“历史学即以此活历史为所研究之对象者也。一切史书皆为纪述解释此活历史而作，故皆为此活历史所据之领域。”^⑫尽管历史认识包含有主体的因素，即对史料的解喻必然随人们知识的进步而发生变化，但决不能由此否认历史过程构成了解喻的本体论前提。如果片面夸大解喻的主体因素，势必导致对历史过程客观性的否定，从而把历史认识归结为一种纯粹主观的东西。需要指出的是，解喻本身并不是主观随意的。在比较 Herodotus 与 Grote 的《希腊史》之后，李大钊指出，后者对希腊历史的解喻之所以比前者较为完善和正确，并非是因为后者的天分比前者高，也不是前者比后者爱说谎，而是“时代所限，无可如何”^⑬。质言之，解喻的历史性决定了任何解喻都无法超越解释者所处的特定视域，而与这种历史性内在相关的特定视域则担保着解喻的客观性。

历史解喻随历史观的变动而变动，这表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总是相对于拥有相同历史观的历史学家共同体而言的。由此李大钊明确提出了“历史的重作”的思想：“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⑭就其理论来源来说，这一看法极有可能来自于李凯尔特，因为后者不止一次地指出，“历史一定要被一再地重新撰写，但这一点并没有否定历史的科学性”^⑮。不过，李大钊对

历史重作的强调，不仅是因为有见于历史观对历史解喻的制约，更有其认识论上的一般根据，即不存在终极性的认识，真理乃是随世运而变迁的东西。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一直为近代中国史学理论家所关注。相对主义史学从历史事件的一次性、史料的片面性与主观性出发，往往否认历史过程的可知性。他们片面强调主体在史料选择和历史解释中的作用，认为“一切的历史知识与现实认识都是主观的，事实的了解与认识必须主观，并且非主观不能算为彻底的明了”^⑯，完全否定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实证主义史学主张用经验科学的模式改造传统史学，建立“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科学史学，但他们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以为只要利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去整理史料，就能建成纯粹客观的史学。在这种背景下，李大钊从经验与理论、客观与主观、绝对与相对的辩证联结中理解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无疑是一种更为合理的思路。

四、从学术求真、人格培养到意识形态批判

对于历史学内在价值和外在功能的讨论，是史学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的最后一节专论“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的原因所在。

传统史学的近代化往往和科学精神或科学态度的确立联系在一起。“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⑰尊疑要求以怀疑的态度对一切以往的材料、学说等重新作批判的考察；重据则强调无证不信，主张如实地把握对象。在史学研究中，尊疑和重据首先指向的是真理。依李大钊之见，史学的求真已不再局限于文献考证意义上的求真实，而是具有更为宽泛的内涵：“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正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⑱较之儒家仁知统一的传统对于知识的内在价值的忽视，李大钊认为史学研究在于求真，要求为真理而求真，其深层意义就在于以相当的历史自觉突出了知识的内在价值，并赋予知识以独立的品格。

不过，尽管求知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区分出“为实用而求知”与“为真理而求知”两种向度，但学术研究总是难于和人的历史实践相分离。一般而言，科学的价值总是展现为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与追求真理的认知过程相联系，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于广义的社会规范作用。就史学研究的外在价值说，李大钊认为：“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凡学都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

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④一方面,史学研究旨在以科学的态度追求历史之真(历史事实的真实与历史规律的正确表述);另一方面,以科学态度从事史学研究,将有助于造成“认真的习性”——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李大钊在此强调的正是贯彻科学态度的史学研究在培养理想人格过程中的教化作用。

史学具有的外在价值,不仅体现在人格培养过程中,还体现在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⑤,如果不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就不可能对人类社会历史过程有正确的认识。由于历史研究因唯物史观而成为科学,而唯物史观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因此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澄清旧的意识形态(历史观)对于实际历史过程的遮蔽。

首先,史学研究有助于澄清对历史过程之实践本质的遮蔽。按李大钊之见,旧史观通常认为历史是神造的,由天命决定,而根据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新史学,历史实质上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作为那些投身于现实的人们的创造活动,实践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⑥这样,历史的内容就还给了历史,即实践构成了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而劳动发展史则蕴含着社会发展史的全部秘密。

其次,史学研究有助于澄清对历史总体性的遮蔽。旧史观往往从两个方面遮蔽了历史的总体性:其一是以部分涵盖整体,将整个历史过程归结为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其二是用上层说明历史,把历史的动因归结为各种非物质的力量。李大钊指出,既然历史学是各个特殊的历史学的总合,那就应当承认经济关系在社会整体构造中的基础性地位,承认经济在整个文化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办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⑦

再次,史学研究有助于澄清对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遮蔽。李大钊认为,旧史学往往遮蔽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但“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则不然,……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指导过去的历史,

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⑧

最后,史学研究有助于澄清对于历史进步性的遮蔽。在李大钊看来,如果以历史过程的价值本位为准,旧史观在总体上都属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而现代史学则认为,“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退落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越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奋进的人生观。”^⑨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在史学理论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仍然处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两极对峙之中。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对历史学的对象、目的、方法论和价值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既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某些不足,又指出了相对主义史学观点的若干纰漏,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建构史学理论的最初尝试。

旧世界范围内历史哲学从思辩的向分析的转移来说,虽然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绪论》和曼德尔鲍姆的《历史知识的问题》在1938年相继问世,但直到1951年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的出版,人们才开始用“分析的历史哲学”一词与传统的“思辩的历史哲学”相对立。从此以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西方思想界才有由附庸而浸假成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中的显学之势。^⑩早在1924年,李大钊就指出,“有一派哲学家,于哲学问题中特别注重智识的批评之问题。这一派人自然要认历史的智识的批评为主要问题。……这批评的论究,即智识学的论究,今后将日益精微,诚为最堪属望之一事。”^⑪把“历史的智识的批评”即史学理论看成是历史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并对这种批评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这确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史学要论》已察及从事史学理论反省与批评之新式历史哲学的价值和远景。^⑫不过,尽管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构作了最初尝试,但史学理论的发展并未如其所料地“日益精微”。长期以来,无论是哲学界还是史学界都未能给予分析的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应有的重视,李大钊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也为后人所忽视。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李大钊精辟而辩证的论述必将成为重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不可回避的思想资源。

(下转第32页)

中考察,这样得出来的观察才会贴切历史原状,才会有历史的内涵和深度,因而也会比较的准确和扎实,经得起历史检验。美国中国学总体特征和欧洲中国研究有诸多区别,但其特殊的背景地位也使其研究更具普遍价值和学术魅力。而我们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也主要是出于学术互动的需要。我们和海外的中

国学之间的交流实在不能算多,这当中的对话和互通信息显然十分重要。美国中国学中的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成为我们自身研究的可贵资源,而其错误的理论观点也将是我们的一种镜鉴。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 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研究中心和外事局编写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的“编者前言”的主要的观点是,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不能简单地以“汉学”泛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②在这问题的阐述上,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一篇谈话颇有参考意义。可参见周勤博士《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载《世界汉学》创刊号,1998年5月,《世界汉学》杂志社。

③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Harry Harding Editor: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p. 16)

④ John M. H. Lindebeck: *The Developmental Decade (Understanding China -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⑤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Harry Harding Editor: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p. 27)

⑥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Edited by John King Fairbank, with contributions by John King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Lien - Sheng Yang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Wang Gunwu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 Background Essays*, Joseph F. Fletcher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938 - 1884 and many other essays.*

⑦美国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撰有《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台湾《新史学》第10卷第2期,1999年10月)等论文,对这方面情况有较具体分析。

⑧ Fairbank Center: 4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April 26, 1966. <http://www.fas.harvard.edu/Tefairbank/40thReport-Fulltext.html>

(上接第19页)

注 释:

①②④⑦⑩⑬⑭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2、715-716、717、669、640-641、724、752、724、689、718-719、677-678、761-762、678、761-762、346、764、763-764、75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9页。

④《自然科学的概念形成的界限》,第401页、第464页,转引自K. C. 巴克拉捷《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涂纪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22页。

⑤《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页。

⑥有关李凯尔特对李大钊历史哲学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批判性回应,参看晋荣东:“李凯尔特与李大钊的历史哲学”,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11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2001年第3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64页。

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3-244页。

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4-183页。

⑩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6页。

⑪参见王国维1916年致林泰辅书,载《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6页。

⑫参见《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出版公司1980年,第310-311页。

⑬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121页。

⑭雷海宗:《史实、现实与意义》,载《北平时报》1947年10月19日。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6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1页。

⑰参见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49-250页。亦见何兆武:“从思辩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

⑱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页。